

著名汉学家研究丛书

# 汉学先驱巴耶尔


〔丹〕龙伯格 著

王丽虹 译

T.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汉学先驱巴耶尔

〔丹〕龙伯格 著

王丽虹 译

著名汉学家研究丛书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先驱巴耶尔 / (丹) 龙伯格著; 王丽虹  
译.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10  
(著名汉学家研究丛书)  
ISBN 978-7-5347-8706-5

I. ①汉… II. ①龙… ②王… III. ①巴耶尔  
(1694~1738)—生平事迹 ②汉学—研究—德国  
IV. ①B979. 951. 6②K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733 号

著名汉学家研究丛书

## 汉学先驱巴耶尔

HANXUE XIANQU BAYEER

龙伯格 著

王丽虹 译

---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徐清琪  
责任校对 裴红燕 毛路  
封面设计 王莉娟

---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6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7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献给 Tua

## 鸣 谢

在研究巴耶尔及其汉学成果的过程中,本人得到来自个人及机构的帮助和指导。感谢美国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Cedar Rapids)寇伊学院(Coe College)的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教授,他身为汉学专家,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感谢阿胡斯(Aarhus)的彼得·特科尔森(Peter Terkelsen)硕士,他不厌其烦地校对了《中国博览》(*Museum Sinicum*)序言部分和巴耶尔著作的其他几个部分的翻译。还要感谢阿胡斯大学东亚研究室的讲师顾尔素(Else Glahn)夫人、安妮·威德尔-威德尔斯伯格(Anne Wedell-Wedellsborg)和陈献春(Chen Xianchun)等人,以及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易家乐(Søren Egerod)教授和讲师李来福(Leif Littrup)先生,他们帮助我解决了一些汉语语言方面的问题。尚蒂伊(Chantilly)“封丹”(Les Fontaines)图书馆的档案专家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神父多年来在很多方面给予我帮助,为此我深表谢意。

阿胡斯国立图书馆、柏林皇家图书馆、哥本哈根各大学的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尚蒂伊“封丹”图书馆、柏林原联邦德国普鲁士文化国立图书馆、柏林原民主德国国家图书馆、罗马梵蒂冈使徒图书馆、列宁格勒科学中心档案馆等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图书资料员为我提供了热情有效的帮助,使我受益匪浅。我很高兴并很荣幸地向他们所有人表达我的谢意。

我要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特别文献部助理馆员大卫·J. 韦斯顿(David J. Weston)先生,他指导我一步步研究他本人整理分类的格拉斯哥图书馆巴耶尔文献部分。

## 前 言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增加我们对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欧洲汉学的了解,尤其是了解中欧和东欧汉学的诞生及其早期研究情况。

本书介绍了台奥菲鲁斯(哥特利布)·希格弗里德·巴耶尔一生的汉学研究。巴耶尔一生短暂,前半生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古老的文化学术中心康涅斯堡工作,其生命的最后 12 年于当时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度过。

在巴耶尔生活的那个时代,欧洲的哲学家们热爱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形形色色的事物非常热衷。当时耶稣会虽然势力强大,但事实上他们受到普遍攻击。在华耶稣会士们在书中把中国描绘成“天国”形象,然而对此驳斥的声音也时有所闻。从仰慕中国到鄙视中国,这一潮流的逆转出现在 18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然而,巴耶尔自始至终并不崇尚中国——他最后一部著作可能加速了欧洲汉学热的衰落。巴耶尔最初只是对海路尚未开辟以前的印度以及亚洲的基督教会的历史怀有浓厚兴趣。巴耶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一位优秀的、训练有素的人文科学工作者。他开始对福音书和基督教义广泛传播的亚洲南部和东部,尤其是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地区的语言产生兴趣。

基于巴耶尔出版的著作及其手稿和信件,本书将探讨他如何开始汉语语言和文献的研究工作,以及他在各种冲动的驱使下为这项事业献出其毕生精力的学术历程。

目前,巴耶尔的汉语研究成果中唯一为人所知的——而且也只是知道一个书名而已——就是他的《中国博览》一书。他后期的汉学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大多数著作仅发表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的年刊《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评论》(*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erialis Petropolitanae*)上。

《中国博览》的前 100 页为序言,介绍巴耶尔汉学研究历史,从他最初对 17 世纪汉语研究的了解和认识开始,到最后以类似一种汉学研究自传的形

式结束。本书翻译了这一部分,将其呈现给读者,因为它生动地展现了早期所谓“汉学研究”的状况。在当时,与其说中国令人欢愉和满足,不如说欧洲出于猎奇的心理而对它充满向往和渴望。

龙伯格

## 汉字二三言

在这本书里,某些简单的有关汉语的词语和概念反复出现。为了使那些对汉语一无所知的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下面对其做一个简要介绍。

众所周知,汉字不用字母或音节符号书写,而是由线条和笔画组成。大部分汉字据说包括两个不同的要素:一个要素通常被称作部首,经常但不总是代表或表示汉字的字义;另一个要素是声旁,在很多情况下只是近似地给出字的读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称作部首的要素在数量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从17世纪到最近,214个部首系统已被广泛接受并在汉语字典里普遍使用。在这些字典里,每个字都有一个部首作为这个汉字的一部分。但是在这方面也有某些任意性,因为很多汉字包含了不只一个部首。传统上被认为是“从属于”这个部首的汉字在字典里根据线条或笔画,从1画到20多画,都列在这个部首项下。

欧洲第一本汉语-欧洲语言字典——《汉语、法语和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1813年在巴黎出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编排的。从那以后,学汉语的学生使用的字典大多数根据汉字读音的字母表顺序编排,但它们都有一个部首索引。在索引里,根据上文提到的214个部首系统编排汉字。这个系统非常有必要,因为即使不知道一个字的读音,也能根据它查找到这个字的字义。

在本书里,我们将看到很多关于汉字、偏旁部首和语音,尤其是关于汉语字典方面的介绍。巴耶尔一生自始至终认为字典的汉字编排是汉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巴耶尔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字典中排列的单个汉字的结构和意义?我们将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巴耶尔相信在汉字的混乱表象下存在着一个系统。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感到汉语出了问题——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个系统,而这一系统将由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欧洲语文学家来重新发现。

至少在原理上可以说汉字的读音都是单音节的,尤其是较古老的形式。



音节的数量有限,但是每一个音节都有所谓 4 个声调,每一个声调变化都会引起意义上的改变。然而,巴耶尔从未有机会研究汉语的声调系统。

## 展开西方早期汉学的丰富画卷

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那么我们可以把从《马可·波罗游记》前后直到耶稣会入华这一段时间称为“游记汉学”时期。这期间有不少作品在西方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元朝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大航海以后拉达的《记大明的事情》、平托的《平托游记》、皮尔资的《东方志》等,其中以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为其发展的顶峰。这些作品的基本特点是仅停留在对中国表面的报道上,尚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故以“游记汉学”给以概括应较为准确。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并在中国腹地肇庆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仙花寺”,从此拉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帷幕。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由于入华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的“合儒排佛”,适应中国文化的路线,他们读中国古书、念儒家经典、广交朝野文人,努力以中国的语言 and 传统去传播基督教,取得了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中国还尚未被当作一个实证的、科学的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汉学大体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

业汉学”三个时期。我这里所说的西方早期汉学主要指“传教士汉学”。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较之“游记汉学”时更为可靠、更为准确,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在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我们逐步认识到在“游记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仅仅用“传教士汉学”来概括是不够的,因为尽管这一时期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主体是来华的传教士,但同时在欧洲也有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如这本书所提到的巴耶尔、门采尔、米勒等,这批人以德国人为主,还有英国的约翰·韦伯,后来还有法国的傅尔蒙、弗雷烈等人。这样,我现在感到将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研究仅仅称为“传教士汉学”不妥,而将这一阶段称为“早期汉学”阶段较为合适,早期汉学既包括传教士汉学,也包括在欧洲专业汉学兴起前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

我和同事曾一起翻译的基歇尔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几年前在大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欧洲产生的影响比利玛窦的《基督教进入中国史》大得多。基歇尔在早期汉学史中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物。一方面他本人是耶稣会士,而且《中国图说》的主要材料也来自来华的耶稣会士,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归于传教士汉学之中。但另一方面,他并未来过中国,《中国图说》也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那样浓重的传教色彩,更多是欧洲早期东方学的学术路向。

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中,没有来过中国,也不是教会背景,但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第一个人就是巴耶尔。

巴耶尔是17世纪德国汉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新教家庭,从幼年时起就显示出卓越的学习才能,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16岁时就被康涅斯堡大学录取。在那里他研究神学、哲学和希伯来文。1716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德国游学,在柏林见到许多重要的东方学家,在皇家图书馆看到了门采尔留下的手稿,并收集了各种传教士著的关于中文的字典。从19岁起他就开始对汉语着迷,游学时和东方学家的接触也深刻地影响了他。1718年回到康涅斯堡后,他在市立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作为古希腊和罗马史研究的专家,他出版了四本关于希腊和罗马史的著作,同时,他还保持着自己对汉学的热爱,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学专著《中国日食》(*De Eclipsi Sinica*)。

1726年2月,巴耶尔接受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的邀请,担任那里的希腊和罗马古代历史研究主席,从此开始了他在圣彼得堡的生活。

“1730年以后,巴耶尔越来越沉浸在汉学研究上,导致他在帝国科学院的职位发生了变化。1735年,帝国科学院决定让一位年轻的德国古典派学者约翰·乔治·洛特(Johann Geoge Lotter, 1702—1737)取代巴耶尔古希腊罗马历史研究主席的职位,而巴耶尔则成为古代东方学的教授。”<sup>①</sup>这样,巴耶尔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职业的汉学家。1730年他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他的汉学研究代表作《中国博览》,这是一部两卷本的“汉语教科书”,虽然从今天的水准来看其十分肤浅,“但它是在欧洲印刷的第一部关于汉语语言的著作”<sup>②</sup>。

《中国博览》的序言中巴耶尔用了近5万字讲述欧洲早期汉学的发生,主要是17世纪德国汉学发生的历史,这一段叙述说明了巴耶尔作为欧洲最早的汉学家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有了一种很明确的学科意识。这样的一种汉学史的回顾在欧洲学术史上是第一次。他第一次将汉学作为欧洲东方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将汉学的研究和欧洲学术史上的中亚史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相联系,从而使欧洲的学术界认识到汉学研究在欧洲的关系及其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博览》的序言后有两卷,第1卷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汉语语法的,巴耶尔将收集到的卫匡国的语法和柏应理的语法作为基本材料加以研究。第二部分是他在柏林皇家图书馆找到的一本漳州方言的语法。巴耶尔将其誊写下来,想告诉读者中国方言的特点:在这两部分之后,他还将收集到的米勒的《汉语关键论题》以及《传教士给巴耶尔的信》《米勒关于中文的信》作为三篇单独的文章附在后面。

《中国博览》的第2卷“包括两本字典和一些文章。在第一本字典里,我描述了汉字应该怎样分类及如何根据其构成要素进行查找。我本想以更准确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弄出一本800000汉字以上的巨著来,而这既非我的意图也非目前的手段和方法所能办到的。事实上,到现在我仅收集了10000多个字,就连这些我也不敢全部铺列在这本书中,以免书的印刷成本因此而更加高昂”<sup>③</sup>。这个字典有42张镌刻汉字的版和119页对照音译和意译表。最后是三篇配合学习语言的文化资料:第一篇是他从殷铎泽在果阿出版《大学》译本后所附的《孔子传》的短文;第二篇是他

① 参见本书第22—23页。

② 参见本书第23页。

③ 参见本书第93页。

对柏应理主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做的修改,柏应理原计划在巴黎版上刻上中文,后来有困难没做成,巴耶尔在《大学》这篇文献中配上了汉字,同时,还做了注释;第三篇是曾被他使用过的《小儿论》,他也对这篇文章做了注释,加了汉字。

《中国博览》是当时欧洲汉学文献的集合,巴耶尔几乎找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有关中文的语言资料和文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解释的深度上,巴耶尔都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前辈——米勒和门采尔。

巴耶尔的汉学研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当时的汉学研究是在中国本土和欧洲同时展开的。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在书写着他们的传教士汉学,而巴耶尔在圣彼得堡书写着欧洲本土汉学。巴耶尔也许是当时在欧洲的本土汉学家中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汉学家联系最多的汉学家。他本人与北京最有名望的耶稣会传教士建立了私人联络。这些人是宋君荣、巴多明、戴进贤、徐懋德、严嘉乐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接纳了他并经常在信中激励他,送给他中文书籍和字典来帮助他。“巴耶尔,这位欧洲的汉学先驱,是入华耶稣会汉学家的学生,起先他们之间的联络是间接的,随后便是直接友好的接触。”<sup>①</sup>正是在巴耶尔这里我们看到经过传教士汉学这个环节,东方的知识如何传递到西方,并逐渐催生了西方早期的汉学研究。

巴耶尔被称为欧洲第一个职业汉学家。他与雷慕沙的区别在于,当时他在圣彼得堡的位置尚未像雷慕沙的位置那样明确,他基本上是在传统的东方学范围内展开中国研究,他研究的路向仍然受到传教士的重要影响,而没有像雷慕沙那样开辟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他的学术成就自然也没有雷慕沙大。他可以说是欧洲早期汉学中,欧洲本土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欧洲本土汉学研究的奠基人物。

对西方学术思想史来说,欧洲早期汉学的研究至少有两层意义。就学术而言,“欧洲早期汉学”奠定了1814年以后的专业汉学诞生的基础。雷慕沙1815年1月16日在法兰西第一次开汉语课时,用的是马若瑟的《汉语语言札记》的手稿,而德经则一直保持着与宋君荣的联系,并将整理宋君荣的遗稿作为其研究任务,法国19世纪东方学的巨头们则一直关注着传教士汉学名著《中国杂篆》最后一卷的出版。就是说“专业汉学”在其诞生的初期,其学术文献和资料都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西方汉学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143页。

已成为西方庞大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一支,我们若要把握好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来龙去脉,则非要从欧洲早期汉学入手不可,因这是其整个学科的根本,其全部基础。

从思想史来看,西方早期汉学已构成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自大航海以来,西方文化在精神侧面一直在发生着变迁,神奇的东方也一直是西方文化关注的方向。尤其是经“礼仪之争”之后,中国一下子搅动了整个西方。耶稣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修会及其他入华各个修会的传教士纷纷著书写文,申辩自己的立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各省份了解得甚至比对法国本土还要多。这期间西方早期汉学的文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圣西门说“这场礼仪之争产生了惊人的后果”。

“惊人后果”之一,就是一批启蒙思想领袖利用传教士汉学成果,发挥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精神特质,如重人伦轻鬼神的自然神论倾向、确实的历史纪年的历史观等,用中国的精神之火来焚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抨击中世纪的神学。在伏尔泰那里,孔子是理性的象征;在莱布尼茨那里,宋明理学是自然理性的佐证。在这些进步思想家手中,中国传统思想被剥离与解释成为其战斗的武器和旗帜。

“惊人后果”之二,就是引发了持续将近一百年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已不仅仅是在思想家的书斋中孕育,催生出启蒙的思想,而且在大众生活中也成为一种时尚: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看中国皮影戏。魁奈甚至把中国的重农思想作为其经济学的主张,鼓动了法国国王学习中国皇帝春天举行扶犁示耕仪式,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早期汉学实质上是近代欧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若不从欧洲思想本身的变迁来研究这批文献,就无法评估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若将“欧洲早期汉学”对东西两方的意义放在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得出更为深刻的结论。一般认为世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地中海的文明就是近代文明,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南北美洲和亚洲向欧洲俯首称臣、向其学习的过程。但西方人给予我们的这一套世界图景是否真实?在经济学上美国学者弗兰克对此提出了挑战,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想说明,在哥伦布、达伽玛以前就有一个世界体系,其中心是亚洲,是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欧洲。他以当

时白银的全球流动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弗兰克的观点还有待完善,但他的确恢复了一个从19世纪以后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所忽略的事实:1500—1800年间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当时中国的富强与国力是欧洲无法相比的。以1960年的美元价格做计算,英国1700年人均收入150—190美元,法国1781—1790年人均收入170—200美元,印度1800年人均收入160—200美元,日本1750年人均收入160美元,而中国1800年人均收入228美元。这些数字是布罗代尔所提供的。他也认为当时欧洲决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其实早在弗兰克以前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拉克。他毕尽一生学术精力所写的皇皇大作《在欧洲形成时期的亚洲》证明:世界一直是一个互动的体系;欧洲在形成近代观念、走向近代社会的历程中并非一枝独秀,欧洲人也并非比亚洲人高明多少。在他看来,世界的近代体系既是一个欧洲影响亚洲的过程,也是一个亚洲影响欧洲的过程。

如果说《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从经济上证明了东西方的互动与亚洲的经济中心地位,那么由耶稣会入华所开启的西方早期汉学则证明,自观念形态上而言,世界近代的思想并非只属于欧洲,或者说西方早期汉学的存在说明并非只有欧洲的观念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亚洲的观念就与近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思考,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赖以解释世界体系的理论,我们现在所用以说明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观念,我们长期以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几乎全部的论点都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这个基点上推演出来的。如何从欧洲的“路灯光影”以外重新评说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大问题。而解开今日世界之谜,打破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

从这个方面来讲,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论题,尤其是对重新理解世界体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何将这两个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实证性的研究与整个世界体系的研究融为一体,从而为重新了解中国与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探索新的方向,是“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中的一个总体目标和原则。

本书的译者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王丽虹老师,她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工作。丹麦已故学者龙伯格是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学者,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将本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可以为我们展开一幅更为丰富多彩的欧洲早期汉学的画卷,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张西平

2015年写于盛夏之中



## 中译者序

早在 2003 年年初,受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之托,我接手翻译《汉学先驱巴耶尔》一书。他们的信任可能主要来自我曾经在作者的故乡丹麦学习过。由于初涉汉学领域,忐忑之状可想而知。其间,来自汉学中心同人的鼓励和多方帮助使我在知识背景与时间精力皆有所不逮的情况下历经一年多时间,完成译文初稿,后几经修改,终于在 2004 年 10 月我赴英国访学前,将译文交到海外汉学中心,但不乏惭怍,因实属汉学研究的门外汉,且仍留有大量拉丁语书名待译。多年在国外忙于学业,间或有来自中心和出版社的通信,对译文体例和图文格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受时空之所限,往往未能及时佐助。疏于顾及《汉学先驱巴耶尔》一书出版的主要原因是此书版权问题一直没能及时解决,由于原出版社已经不复存在,作者龙伯格先生去世后版权所属为其后代,而一时又很难联络上其在丹麦的亲属,就这样译本又是几经搁置。

时隔数载,自 2011 年至今我有幸受命于国家汉办和北京语言大学被派往美国工作,任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和海外汉语推广的光荣使命,这也再一次拉近了我与海外汉学研究的距离。2014 年,我在十五年之后再访哥本哈根,并有幸见到丹麦商学院孔子学院院长曹伯义和奥尔堡大学韩涛声先生,提起与丹麦的这份渊源,经两位帮忙终于找到龙伯格先生的外孙尼古拉·克劳森先生,克劳森先生欣然签署了版权使用的授权书。至此,十年未果的中文译本终于即将问世。

汉学中心的拉丁语专家百忙之中补译了大量拉丁语的书名,刘若梅教授、张明明老师在译著出版过程中都给予莫大帮助,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也非常关注此书的出版,拨冗作序,也嘱予作中译者序,在此谨向海外汉学中心的同人们致以谢忱。

### 一 龙伯格其人

关于丹麦汉学家龙伯格的中文资料在国内很难找到,1995 年孟德卫先